

DIKOUSANNIAN

敌后三年



浙江人民出版社

革命回忆录

敌后三年

林维先口述

鲁 渔整理

浙江人民出版社

插图 杜滋龄

封面摄影 张克庆

责任编辑 张克炳

敌后三年

林维先口述 鲁渔整理

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
(杭州武林路196号)

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
(杭州环城北路天水桥堍)

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850×1168 1/32 印张8.75 插页2 字数201,000 印数1—28,000

1982年5月第1版 1982年5月第1次印刷

统一书号: 11103·60

定价: 0.75 元

目 录

第一章	春风吹又生	1
第二章	寻找新的立足点	39
第三章	扎下了深根	104
第四章	纵横敌后	150
第五章	走向胜利	226
后 记		273

第一章 春风吹又生

一九三四年秋，徐海东同志和吴焕先同志领导的红二十五军，在鄂皖边的陶家河同白匪梁冠英的二十五路军，激战了几昼夜。这时，我在红二十五军军部经理处生产队。一天傍晚，领导上命政治部总支书记熊大海同志带领生产队，送几十名彩号去土门东北角大山里安插休养。并派二二四团九连和军部手枪团的部分战士护送。由军部驻地上巴田到土门不过三十余里，没有几小时就到了，安插彩号的工作也还顺利。刚把彩号安置好，枪声呼啸，炮声雷鸣，一阵比一阵紧，一阵比一阵密。熊大海同志命令手枪团留下掩护彩号，生产队和二二四团九连兼程赶回驻地。

快要到上巴田，枪声和炮声又稀了下来。人的吆喝声，马的嘶叫声，物件的撞击声混成一片。声音起处，火把齐明。一片片火光，南来北往，忽前忽后地游动着，火苗迎风颤动，好象无数个吃人的鬼怪，吐着贪婪的舌头。火光下，人影绰绰。

“敌人！”不知是谁轻轻地惊叫了一声。

我睁大了眼睛，朝上巴田仔细一看，可不是，军部驻地的稻场上，一队队人马正在集合。是敌人，从他们的形状，从他

们的动作，从杂七杂八的吆喝声，完全可以断定是敌人！再朝两边看看，点点的火光如同夏夜的繁星，布满了左右远近的大小山头，只有我们的脚下是一片漆黑，犹如火把海洋里的一片孤舟。

寒风骤起，乌云盖天，树枝悲鸣，落叶扑面，四周是魑魅世界。不时传来凄厉的狗吠声，小孩的尖锐哭声和女人绝望的惨叫声，好象钢锥似的扎进人们的心头。情况突然变化了，军部驻地叫敌人盘据了。此时，我是五内俱焚，愤恨交集。我下意识地摸摸腰间，腰间没有枪，手榴弹袋子也是空空的。于是对站在我身边的一个同志说：

“喂，有手榴弹吗？给我一颗。”

“我正想找你要呢！”他回答。

是的，除了二二四团九连外，我们生产队的同志都没有武器，而敌人却象蝗虫一样。怎么办呢？熊大海同志命令迅速撤退。我们压住了满腔的怒火，悄悄地缩到山边，钻进了丛林，碰到了一位从上巴田逃出来的老乡。他告诉我们，红二十五军已撤走了，四周全是白匪梁冠英的部队。

红二十五军撤到什么地方去了呢？军部首长们都安全吗？我们怎么办呢？疑问和焦虑在人们的心中搅成一团，上下翻腾。风愈刮愈大，雨又淅沥沥地下了起来，左近山头的火把已经扑灭，敌人的手电筒依然象恶狼的眼睛，闪着恐怖的寒光。枪声炮声又起，借着风势雨威，好似山呼海啸。情况突然变了，主力部队撤走了，一时又摸不清他们撤退的方向。这里是白区，四周是敌人，我们这支同上级失去联系的队伍，真象断了线的风筝，在狂风暴雨中飘摇。同志们惶惶不安地议论起来：

“他妈的，同敌人拚了！”

“拚了？拚了革命就成功了？！”

“不拚又怎么办！难道在这里等死吗？”

“谁说等死！大家想办法嘛！”

“想屁的办法，主力撤走了，就我们这几个人，要枪没有枪，要弹没有弹。”

听了同志们的议论，我暗自忖度，情况是严峻的，在此地迟延下去，的确是死路一条。但是，决不能轻举妄动，必须迅速突出重围，在夜幕里，有深山老林作掩护，凭着同志们的机智和勇敢，凭着党的领导，我们完全可以从敌人夹缝里钻出重围。

我们又继续向深山里撤退。在深山老林里，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，为了不使一个同志掉队，后面的人用手搭着前面人的肩膀，一个接一个，摸索着向前移动。山险阻，路崎岖。再加上山石挡道，树枝碍手碍脚，不是你摔跤就是他撞倒，部队不得不时时停下来。就这样，跌跌撞撞地走着，一直到东方发白。这时，浑身上下湿透，精疲力竭，饥寒交迫。我们还是拖着疲惫的身子向前移动。突然之间，前面出现了一个三五户人家的小山村，我们走上前去一问，原来一夜间只走了七八里路。我们还没有脱离险境，白天更容易暴露目标，大家越发焦急不安了。于是决定暂时在这个小山村隐蔽休整一下。

放出步哨后，全部人员挤进老乡家里。老乡知道我们是红军，忙着为我们生火烤衣。我们围着火膛坐，商量着怎么办？大部分同志的意见是回皖西北老苏区，因为那里是我们的后方，有我们的亲人，更重要的是可以通过皖西北道委找主力部队，万一联系不上，也可以取得道委会的领导。我也非常赞同回皖西北，所以，当熊大海同志问：“去皖西北怎么走？路不熟，又没有一张地图！”我毫不迟疑地回答：“这条路我熟

悉，我可以当向导！”正当我们在讨论时，步哨回来报告，有情况，山下有一个排的兵力正向我们开来！大家听了，立即跳了起来，准备迎敌。

二

一场虚惊，原来上来的不是敌人，是红军二营四连的一个排。他们在陶家河掩护主力撤退时，为了拖住敌人的后腿，同敌人纠缠了一夜，天明前才杀出重围，也准备去皖西北，不期在这里同我们汇合。

这个排的到来，使同志们感到分外高兴。我们的力量突然增加了，似乎增加的不是一个排，而是更多更多的力量。当然，同四周强大的敌人相比，我们还是弱小的，在去皖西北的路上，随时都有被敌人包围的危险。于是，我们晓宿夜行，尽走那些荒无人烟的山路，设法绕过敌人的据点。就这样，我们翻越了一座座的高山，穿过了一丛丛的密林，跨过了一条条的溪流，一天天地向苏区靠近。又是一夜行军，黎明前已过了西界岭，再往前走就是皖西北老苏区了。熊大海同志要部队先在丛林里休息一下，天明以后再回苏区。

由于连日行军，疲劳已极，许多同志倒在草丛里就睡着了。我却久久地不能合眼，脑子里老想着皖西北老苏区，一件件往事，在心中翻腾……

我还清晰地记得，我的家乡安徽金寨县农民暴动，成立红军，建立苏区的情景。一九二九年农历三月二十七日夜，也就是立夏节的晚上，我正在姐姐家里，半夜在睡梦中听到一阵锣鼓声，我爬起来往窗外一看，只见丁家埠那头火光照亮了半边天，人声枪声混成一片。我不知出了什么事，想回去看看，可

是姐姐说啥也不答应。天刚亮，我连早饭也没吃，就急着赶回家，看见乡亲们三个一群、五个一堆，站在村头兴高采烈地谈论着什么，孩子们在大人身边穿来穿去，作打仗的游戏。同我相好的几个伙伴，争先恐后地告诉我，昨夜农民联合起来的队伍，冲进民团局子，杀了土豪劣绅，把民团的枪也缴了。我高兴得跳了起来，真后悔没能参加这个真够劲的暴动。跑回家里，父亲也喜滋滋地对我讲述了参加暴动的经过。他说：

“这次暴动是周维炯带头的，他可是一个能人哪，抵不上诸葛亮，也抵得上赵云，有勇有谋呀！”

原来，早在一九二四年，董必武、陈潭秋等同志就在这里领导农民运动，皖西北有党的基础。一九二七年，周维炯同志从武昌农民运动讲习所回到皖西北，根据党的指示，打入了丁家埠民团，任教练兼班长。他一方面作兵运工作，一方面在农民中建立秘密的农协小组。一九二九年立夏节的晚上，按照预先制定的起义计划，他同几个共产党员一块，以过节为名，请反动队长喝酒。周维炯又以值星班长的身份，把担任警戒任务的团丁换成自己人。于是他们轮番把盏劝酒，把反动队长灌得酩酊大醉。看看时候已到，一声令下，一齐动手，这时埋伏在外面的农民队伍，一起冲进民团局子，里应外合，没有多大工夫，就把丁家埠民团全部解决了。就在这天晚上，李家集、汤家汇、斑竹园的农民，也在党的领导下，同时举行了暴动。几处暴动的农民形成了一股革命的浪潮，犹如暴风骤雨，不几天席卷了整个皖西北山区，向豫南发展。

暴动后不几天，成立了苏维埃政府，开始斗地主，分田分地。暴动以前，我们一家五六口人，租种两斗地。父亲带着我们兄弟二人，整天在地里，面向黄土背朝天，累死累活，一年下来，缴了租子，余下的够不上两个月的口粮。我的父亲不得

不在寒冬腊月里，带着我们兄弟去河里淘铁沙，淘好了铁沙还得挑到几十里外的铁铺里去卖。铁铺的老板也是个吃人不吐骨头的，大秤称进，六斤才算一斤。我的肩头都压肿了，也换不了几文钱，买不了几升米，不得不靠借债过日子。穷人借了债，那真是毒蛇缠身，血汗被它吸干！记得有一年我家向一个地主借了两串钱，不到一年的工夫，硬要我家还八串。说起来他还是我的本家，叫林维栋。那年腊月二十四过小年，他到我家逼债。我们家乡有个风俗，这个时候家家户户宰年猪，敬天地，期望上苍保佑来年有个好收成。林维栋一屁股坐在肉案上，双手叉腰，蛮横无理地不准我家杀猪。左邻右舍看了敢怒不敢言，只好帮我们求情，好话说了几箩筐，结果林维栋还是把猪抬走了。这哪是人过的日子！现在好了，我家分进了七斗地，连同原有的两斗，一共九斗地，我家再不愁吃穿了。

穷人翻身了，真正的翻身了。我的两个姐姐都当了村苏维埃主席。我也成了少先队员，还担任小队长。整天价带着十多个十五六岁、十七八岁的青年，拿着齐眉棍下操、站岗放哨，有时也扛着梭镖、土枪，配合赤卫队守口子，打反动民团。然而，最使我们少先队员开心的是斗地主恶霸。林维栋仗着他儿子在国民党里当县官，横行乡里，敲诈勒索，坏透了，我们称他为“富林”。我们这些“穷林”不愿同他共姓一个“林”，不愿同他共一个祠堂。成立苏维埃的第二天就把他逮捕了，让他戴上高帽子，跪在戏台上，要他向农民低头认罪，要他自己讲：“我是恶霸地主，我剥削了农民。”这时，台下红旗挥舞，喊声雷动：“打倒地主恶霸！……”斗争完了以后又拉着他游街。我们少先队员扛着梭镖，走在游行队伍的前面。一面走一面唱我们最心爱的歌子：

八月桂花遍地开，
鲜红的旗帜竖呀嘛竖起来，
张灯又结彩呀啊，
张灯又结彩呀啊，
光华灿烂现出新世界。
亲爱的工友们呀啊，
亲爱的农友们呀啊，
唱一支国际歌庆祝苏维埃。

.....

皖西北老苏区啊，我离开您已有几年了，您用什么面貌来迎接您的儿子呢？

三

天明以后，我们整理好队伍，向苏区进发。愈往里走，愈觉得不对劲；愈往里走，愈觉得苏区变了样；愈往里走，愈不相信自己的眼睛。这是我熟悉的苏区吗？灰蒙蒙的天笼罩着大地，道路上行人绝迹，路旁的树木大部被截断。几只乌鸦无枝可依，噪鸣一阵，有气无力地飞一阵又落在田畈里。远近的田畈，看不见一株禾苗，长满了野草。一路上的大小房屋，茅棚瓦舍，都是墙垣倒塌，屋顶张口，门窗洞开。颓墙断壁上，黄里带黑，明显地烙上了战火的痕迹。

看了这种情景，我们每个人的心里，好象塞上了一块木塞，闷得吐不过气来。为了弄清一个究竟，我们索性进入村庄里去看看。村里阒无人声，遍地是瓦砾、鸡毛、猪蹄、兽骨。再走进一间破屋一看，碗也碎了，锅也拔了，灶里躺着一只野

狗，见有人来，惊得龇着牙齿，嗥叫着向村外逃去。……

这是活生生的一幅劫后图景。我们心里冷了半截，只好退出村子，继续向前走。走不多远，忽然觉得脚下的泥土非常松软。我们愈走愈觉蹊跷，最后大家忍不住了，就把松软的泥土刨开来看。刨了不到半尺深，露出了无数的尸体，有老人，有小孩，有男的，有女的。肌肉虽然溃烂了，但弹伤依稀可见，惨不忍睹。我们赶紧又把他们掩埋起来。这时我感觉血直往上冲，浑身上下直打颤，眼睛里向外冒火。再看看同志们，一个个也是两眼通红，嘴里直出粗气。我相信，这时如果有一个敌人在我们面前，大家定会扑上去，把他撕得粉碎……。

刚刚掩埋好烈士的遗体，从半山腰跑下来几个人，其中一个有六十多岁，他们见着我们，哇的一声，痛哭起来。我们围着他们劝慰了好一会，他们才收了眼泪。这位六十多岁的老大爷告诉我们，此地埋下了三百多口，他们是这三百多口中的幸存者。我们就站在烈士们的坟前，听老大爷讲烈士们遭难的经过——

一天晚上，国民党的十一路军，突然包围了这个村庄，逮捕了区苏维埃主席老江和十多个赤卫队员。第二天，敌人就把他们枪杀了，尸体丢在大路边，要一百块钢洋的收尸费，才允许掩埋。老江和赤卫队员都是村里人，沾亲带故的，平时风里来雨里去，为村里老百姓办事，现在被敌人杀害了还曝尸在外面，村里谁不悲痛呢！敌人要收尸费，村里人拿不定主意，看见老大爷有把年纪，就找他商量。老大爷说：“十多个人，得一千多块钢洋，哪里来这么多钱？再说我们苏区人从来没有向敌人低过头，有钱也不能给他。反正人已死了，再豁出我这条老命吧！”

当天夜里，老大爷同另外两个同志，带了两把锄头，悄悄

地摸到大路边，准备挖一个坑把烈士的遗体埋掉。他们搬动老江尸体时，感到是热的。“莫非他还活着？”老大爷这样想。于是，把手指头放在他嘴唇边试试，他鼻孔里还在悠悠地出气；又摸摸他的胸口，心也在微微地跳动。老大爷就对其他两个同志说：“老江还活着，救活人要紧。”他们三人就把老江抬到村后山洞里藏了起来。老江从昏迷中醒来，睁开眼睛第一句话：“敌人没有杀死我，我还要干革命，我忘不了革命。”

敌人发觉老江的尸体不见了，以为村里还埋伏着红军，吓破了胆，象疯狗一样乱咬人，把全村的人都关了起来，把老江的妻子和她未满三岁的儿子也抓了起来。敌人把老江的妻子毒打一顿后就问：“你的丈夫呢？”她被敌人打得青一块，紫一块，浑身上下没有一点好肉，嘴唇直打颤，嘴角向外淌血。

老大爷讲到这里，低下了头，声音变得特别低沉悲愤。一个同志倒了一杯水递给他，他摆了摆手，又继续说：

“同志们啊！我们看着她都痛得钻心。唉！我是看着她长大的呀，当闺女时胆小怕事，就是后来同老江结了婚，也是大门不迈二门不出的谨慎女人哪！真想不到，她慢慢地从地上站了起来，站得那么直，就象平常一样端端正正的。她含着眼泪看了我一眼。我懂得，她让我放心，她挺得住。她用手背擦了一擦嘴角的鲜血，把孩子拉到身边，一句不响，一声不吭。敌人气得拍桌打椅问：‘你男人呢？’她冷冷地回答道：‘不是叫你们杀了吗？’‘他的尸体呢？’敌人又问。她回答：‘问你们自己呀，你们不是派人看守着吗？’敌人被她弄得恼羞成怒，用刺刀对着她的胸膛骂道：‘你这个土匪婆，不把你男人交出来，一刺刀戳死你。’她毫不害怕，突然间，她的眉毛直竖起来，两眼瞪得圆彪彪的，对着敌人骂道：‘你们这些野兽，你们才是土匪，你们杀了我们的人，不让收尸，还找我要

人！告诉你们，我把他埋了，你们这些狗强盗，再杀我吧！红军会替我报仇的！’敌人被骂得面面相觑，毫无办法，又想出了一条毒计：在村头挖了一个坑，把她推到坑边，把她的孩子丢到坑里，威胁说：‘你再不讲，就把你同你的孩子一起活埋掉。’还故意铲起一铲子泥土，掀在孩子的脸上。孩子躺在坑里哇哇地哭着叫着：‘娘呀，娘呀，沙土迷了我的眼睛。’同志们，我听到孩子的哭声，象万箭穿心一样。你们想想，做娘的该有多难受！我看她泪水在眼眶里打滚，但是她没有哭出来，没有向敌人哀求，她是我们苏区人哪！”

老大爷讲到这里才喝了一口水，深深地叹了一口气，又接着讲了下去：

“唉！是我们苏区人。老江的妻子跳下了坑，把孩子搂在怀里说：‘儿呀，儿呀，你把眼睛闭上，过一下就好了。’猛地一下，她又把头抬起来，冲着敌人骂道：‘埋吧！你们这些吃人的野兽，你们只能在女人、孩子面前耍威风，你们敢在红军面前耍威风吗？你们今天埋了我，红军会替我报仇的，总有一天，红军会把你们，连同你们的强盗头子蒋介石一起埋葬掉！’同志们啊！这个时候，我真想冲出去和敌人拚了，可是大家拖住了我，没有让我这个老头子冲出去。”

老大爷的声音突然变得高亢起来，仿佛他自己就是那位受难的孩子的母亲，仿佛敌人就站在他的面前。他站了起来，踉踉跄跄地向前走了几步，指着他面前松软的泥土悲愤地说：

“我说的只是老江的妻子和她的孩子，还有这三百多口啊！强盗们并不甘心，定要找到老江的下落。第二天就在这里挖了一个大坑，把全村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三百多口，都赶到这里来。用枪逼着我们拼出是谁把老江的尸体偷走的，要是不讲，就一起活埋。几百个敌人都端着刺刀，凶煞煞地逼着我

们。我想：‘我讲了吧，免得全村人遭殃。’可是我又想，‘讲出来了，不是把老江又交给敌人吗？不行，他是我们区苏维埃主席。’我正犹豫不决，突然听到背后大喝一声：‘我在这里！’我们惊得掉转身一看，老江正迈步向我们走来。他边走边骂：‘你们自己没有用，没有杀死我，让我跑了，为什么找老百姓！’猛地一下，把敌人惊呆了。我们大家，看见是老江，象决了堤的河水一样向他冲去，把他围了起来，不让敌人再伤害他。敌人气得乱叫：‘土匪，都是土匪。’接着机枪响了，我就失去了知觉。等我醒来的时候……”

老大爷讲到这里又哭不成声了。我们的眼泪被怒火烧干了，大家都摘下了帽子，沉重地低下了头，对敌人的仇恨，象潮水般地在胸中泛滥。过了好一会，我抬起头来向前望去，只见远处一座山峰突起，高出群山之上，巍然挺立。

四

在未回苏区之前，做梦也没有想到，老苏区被敌人糟害成这个样子；回到苏区后，才知道敌人摧残的不是一两个村庄，而是整个皖西北苏区。敌人的第五次“围剿”比历次“围剿”更加凶狠毒辣。他们在“有民就有匪，民尽匪尽”的方针指导下，提出了“驻尽山头，宰尽猪牛，见人就杀，鸡犬不留”的口号，组织杀人队，在苏区开展杀人比赛，一个赛一个。国民党十一路军一个姓马的旅长，在金寨的柳树庄，挖了一个长达几里路的大坑，一夜活埋我革命群众三千五百人。反动民团头子顾敬之每到一处，大喊大叫要开人肉案子，他在汤家汇周围百十里内，用铡刀铡死革命战士和群众一万多人。白匪五十四师在上楼房等地枪杀群众后，为了向蒋介石报功，割下烈士的耳

朵达七担之多！敌人的决心是要把苏区变为无人区。成千上万的人被敌人杀害了，成千上万的家庭给敌人毁了。我的家也同其他许多同志的家一样，遭到了同样的命运，几次遭难被毁。

我记得第一次是在一九二九年夏我们家乡成立苏维埃后不久，国民党反动派调动军队向大别山扑来，红军为了保存力量，从金寨县的丁家埠、李家集向鄂东转移。红军一走，地主、恶霸、土匪就猖狂起来，到处抓人、杀人、放火、抢劫。我父亲是个胆小怕事的老实人，遇见这种情况，自然躲在家里不敢出门。第三天的晚上，我们全家人又象前两日一样，围着父亲坐着，听着窗外不时传来的枪声。每一声枪响后，父亲就是一声叹息：“唉！又不知哪一家遭难了。强盗、土匪，看你们横行到哪一天！”突然间父亲一把抓住了我的手，叮嘱道：“孩子，你长大了，一定去当红军，做红军那样的好人，给穷人出一口气！”房子里没有灯光，我看不见父亲的面孔，但从他讲话的声音，从他紧紧抓住我的手的手劲，可知他是把全部希望寄托在我身上了。

过了一会，枪声象潮水般地涌进了我家的小屋，狗的狂吠声由远而近，接着是一阵急骤的脚步声，和震耳欲聋的敲门声，我们全家都惊呆了，不知如何是好。突然哗的一声，大门被撞开了，十多个凶神恶煞明火执仗地扑了进来，不由分说就把我父亲五花大绑地捆起来。弟弟吓得直哭。母亲拉着那个绑我父亲的家伙，苦苦哀求，谁知他提起拳头，照我母亲胸口就是一拳，将母亲打倒在地。这时我心中腾起了一股怒火，抓住一条板凳，准备向他打去，但是被母亲抓住了。就这样，父亲被他们抓走了。

敌人把我父亲投入监牢里，严刑拷问，要他交代村里谁是共产党，丁家埠的农民暴动是谁带的头。我父亲是一条硬汉，